

论松平定信的重农思想 ——以天明期白河藩政改革为视角的考察

田宇洋^{1*}，石鑫²

(^{1*}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²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重庆 401120)

摘要：宝历年间（1751—1764年）严重的财政危机和尖锐的阶级矛盾迫使日本各大名推行藩政改革以巩固统治。在江户时代中后期称作“明君”的改革者中，松平定信是传统的重农主义思想的代表者。“俭约质素”和“以农为本”是他的思想中颇具代表性的两个主题。从天明三年（1783年）前后白河藩政改革的视角对其进行审视，松平定信推行的俭约质素和复兴农村的政策为宽政改革提供了参考并说明了江户时代中期，藩的生命力和弹性尚存的事实；同时也体现了幕藩体制下传统重农政策的局限性。

关键词：松平定信；藩政改革；重农主义；俭约质素；以农为本

The Agrarian Ideology of Matsudaira Sadanobu in the Edo Period: Taking the Shirakawa Domain's Political Reforms during the Tenmei Era as an Example

Tian Yuyang^{1*}, Shi Xin²

(^{1*}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School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²School of Administrative Law,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Horeki era (1751–1764), severe fiscal crises and sharp class contradictions compelled many daimyo across Japan to implement domain—reforms in an effort to consolidate their rule. Among the reform-minded leaders of the mid-to-late Edo period who came to be known as "enlightened rulers", Matsudaira Sadanobu stands out as a representative figure of traditional agrarianism. Two central themes in his thought—frugality and simplicity, and the primacy of agriculture—are particularly impressive. Viewed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domain—reforms in Shirakawa around 1783, Sadanobu's policies promoting frugality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served as a reference point for the later Kansei Reforms. These initiatives also underscore the continued vitality and resilience of domains during the mid-Edo period, while simultaneously revealing the inherent limitations of agrarian-centered policies within the Bakuhau system.

Keywords: Matsudaira Sadanobu; Domain—reforms; Agrarian Ideology; Frugality and Simplicity; Placing agriculture at the core

- 44 -

基金项目：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备案中心四川师范大学日韩研究院2024年重点课题“德川幕府中后期日本与欧洲关系的演变”（项目编号:2024RHZD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田宇洋（2000-），男，陕西咸阳，硕士，研究方向：日本史

石鑫（2002-），女，四川资阳，博士，研究方向：纪检监察学、日本史

通信作者：田宇洋，通信邮箱：951403757@qq.com

引言

江户幕府成立以来，重农思想在日本经济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在藩政方面，这主要体现为对自然经济的保护。但在田沼时代天明饥荒席卷日本大半，导致各藩受灾严重，东北地区的八户藩、盛冈藩等甚至出现了“路边、草间饿死者无数”的悲惨情况^[1]。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松平定信治理之下的白河藩受灾程度较小，甚至有“领内无一人饿死”的说法。如此成果，离不开松平定信在重农思想指导下所推行的治藩政策。

长期以来，国内史学界较重视以幕府为中心的三大改革和幕末变革的研究，容易忽略江户时代中期以来的藩政改革及其指导思想。就日本史学界而言，虽然有关松平定信的研究已经十分丰富，但以小野将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也在近年来重新审视松平定信的重农思想。因此，本文试以松平定信主导的天明期白河藩政改革为视角，通过对相关政策和著作进行解读，考察松平定信的重农思想，并对其影响试作探讨。

1. 松平定信重农思想的缘起

天明三年（1783年），伴随着频繁的自然灾害和极端异常的气候，日本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饥荒，东北、关东地区饿死者无数^[2]。除了受灾最为严重的八户藩、弘前藩以外，就连幕府的心脏地带江户，也因浅见火山喷发，而出现了“天降沙石，民众因巨响而惊恐”的状况^[3]。彼时，幕政由老中田沼意次等人主导。他们积极推行利益追求型政治，这使得奢靡之风更进一步滋生。虽然幕府也于同年发布俭约令^{[4](488-489)}，但这丝毫不影响田沼意次等人参与卖官鬻爵，甚至公开收受贿赂^[5]。毕竟在意次看来，“儒者之论对解决财政问题毫无帮助”^[6]，被重商主义裹挟的他，所优先考虑的是如何为幕府解决财政问题。

田沼政策虽然有适应现实的一些特点，但这实质上是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上来发展商品经济的，导致商品经济和幕藩体制间的矛盾进一步扩大。具体来说，意次政权基本继承了享保改革以来的重税政策，同时又允许特权商人支配商品流通，导致了物价上涨和商品流通不足，农民受到沉重打击。在这样的情况下，意次等人却忽略保护民众的生存，甚至加强对民众请愿活动的镇压^{[4](902-903)}。因此，饥荒诱发了自江户幕府成立以来，数量空前的暴动^[7]，幕府与各藩为之震动。而田沼意次的重商主义改革，也逐渐走进了死胡同。农村的衰败和农业伦理的崩塌，为幕藩体制带来了危机。在自传《宇下人言》中，松平定信直观地描述了天明期农村荒芜，农民流离失所的情况：农村人口减少，就连邻近江户的关东部分地区都出现了大片荒地。许多村庄只剩下名主，其他的人都跑到江户去了。社会风气逐渐衰落^{[8](113-114)}。

饥荒带来的问题不止出现在天领（幕府直辖地），位于关东地区东北部的白河藩，也遭遇了民生和财政等方面的困境，这成为了松平定信重农思想的重要缘起。

白河藩以陆奥国白河郡、石川郡等地和越后的鱼沼郡等地为封地，共计约十六万四千石。明和八年（1771年），御三卿之一的田安家初代当主田安宗武把第七子贤丸过继给白河藩藩主松平定邦，并定名为松平定信。然而，彼时的白河藩并非富足安定之地。因气候异常、税收增加等原因，藩内农民逐渐贫困化，他们不得不选择逃亡等方式谋求生路，白河的人口逐渐减少。不仅如此，武士也大量贷款，使得白河藩的财政更加捉襟见肘^{[9](14-15)}。到了天明元年（1781年）前后，白河藩的状况更加令人担忧，即所谓“民众苟且，安于现状，并不按照法令行事，藩政问题频发”^{[8](46)}。至天明三年（1783年）饥荒袭来，白河藩的情况更加恶化，在天灾的影响下，藩内粮食紧缺，局势动荡，甚至有暴动事件发生。不仅如此，富裕的家臣还相互勾结，趁藩内缺粮之际，囤积米粮，哄抬物价。而彼时的藩主松平定邦身体多病，在饥荒发生之初，他甚至因病推迟了返回白河藩的行程，这对藩政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天明三年（1783年）9月3日，为实现米粮调遣，缓解粮食危机，松平定邦在养子松平定信的辅佐下，带病辗转于白河、江户等地，并恳请会津藩主的协助，协商以白河藩的江户扶持米来交换会津藩的藩米。最终，有超过10000俵来自越后的粮食、6000俵来自会津的粮食、以及约7000俵来自西国的粮食运抵白河藩^{[9](54-55)}。这些用于救济的粮食大致按照人数进行分配。此外，诸如干叶、鱼干等食物也被用于救济武士和没有吃食的民众^{[8](57-58)}。

但同年9月11日，松平定邦尝试以“人别扶持”（减少家臣俸禄）的方式缓解财政压力，便遭到了门阀家臣的强烈反对。即便如此，定邦救济民众的决心鼓舞了年轻的松平定信，后者另辟

蹊径，于9月12日，令豪商出钱出粮来救济民众，相对改善了藩内民众的处境。其中较为著名的有须贺川的商人内藤平，他提供了约2000两金钱和2000俵粮食；镜沼村的商人常松次郎也提供了约1000俵的粮食。为了记录这些豪商的付出，定信下令将他们的捐赠事迹记录在名为“感札”的木板上，供人纪念和参拜。

然而，持续通过其他大名援助和豪商“割肉”的手段来缓解饥荒和财政问题也非长久之计，藩政改革已刻不容缓。在养父隐退后，松平定信迅速采取行动，推行俭约政策和农村复兴政策，将自己的重农思想运用到改革实践中去，由此揭开了白河藩政改革的序幕。

2. 俭约：松平定信重农思想的重要主题

松平定信虽然自幼多病，但聪慧过人，文武兼修^{[10](24-26)}。在少年时期，他就热衷于学习儒学经典，并明确表达了自己关于农业、农民的认知：

“作为人君，首先需要明德，以德治民。而以德治民的要义便是对农民常怀慈悲之心”^[11]。

聪慧且恪守武士之道的松平定信自幼便十分关心农业和农民问题。而定信重农思想的主题之一，就在于对俭约质素的倡导。在作品《政语》中，他提到：

“人君应该把俭约质素作为最重要的品质……代代英主贤君都遵守俭约质素之道，而身死国失的君主往往都是骄奢淫逸的。国家的盛衰兴亡，与俭约质素之道息息相关^{12}”。

俭约，即要求在生活中保持简朴，杜绝奢华或浪费；质素，则可以被理解为保持朴素的心态和习惯。值得注意的是，松平定信并不是俭约质素的首倡者。早在德川幕府成立初期，节俭就是幕府对武士阶层提出的基本要求之一^[13]，也是幕府正统学说朱子学中的重要内容，却很难真正落到实处。和定信同一时期的幕府当权者田沼意次、井伊直幸等人都是贪污腐败，生活奢侈的武士，他们卖官鬻爵、收受贿赂，使得武士阶层内部的风气败坏。因此，作为未来的白河藩主，定信十分重视强调俭约质素之道，并在藩政改革的实践中将其具体化。天明饥荒发生后，定信召集家臣，对众人直接表达了自己的心愿和要求：

“眼下正逢凶年，而目前我白河领内的不幸之事发生相对较少。对此，我们并不应该感到惊讶和庆幸，而是应该在凶年做好准备，严格要求自己在生活中俭约、质朴，坚如磐石，并教导民众俭约之道才是^{[8](55)}”。

这样的号召包含两点信息。首先，在松平定信的自传《宇下人言》中曾有“浅见火山喷发，江户震动，气候出现异常，雨水过多”等记载^{[8](53-54)}，这些记载体现了定信对彼时的异象有所察觉，强调俭约质素以应对天灾，保护民众已是燃眉之急。其次，江户中后期以来，家老权势扩张成为常态^[14]。刚刚成为藩主的定信为了巩固自身地位，不得不选择延续养父松平定邦的做法，弘扬幕府历来强调的节俭作风。随后，定信又将家臣召集到书院，并正式告知他们说：

俭约质素是我等的本分，若我等过于奢侈，民众会对我等嗤之以鼻^{[8](56)}。

松平定信率领家臣团以身作则，弘扬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并尝试将其推行至整个白河藩。在吃穿用度方面，定信带头做出详细规定。其原则是在保持武士作为统治者的体面和威严的前提下，尽全力减少开支。为此，他要求各家臣减少吃食，每天早上只允许一菜一汁的饭食，午饭则为两菜一汁，并且所有家臣的衣服都必须改为木棉材质，连出行时所使用的布垫都替换为了粗制的，禁止使用珍贵的绸缎和贵重物品^{[8](56-57)}。

自幼便熟读儒家的“圣贤之书”，并严于律己的松平定信必然把俭约质素落实到政治实践中去。为应对凶年的自然灾害和商品经济对武士阶层造成的冲击，俭约质素便是统治者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德行。在天明六年（1786年）完成的作品《修身录》中，定信根据在白河藩推行俭约政策的实践，简要总结了自己关于俭约政策的具体设想：

“俭约的第一要务在于确立法规，规定即以收入为基础，必须坚持着强硬的立场，按照（藩内）每年的需求进行调整。因此，务必减少不必要的开销^[15]”。

这不仅是由白河藩政改革的政治实践得出的经验，也是松平定信重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看来，俭约质素不仅可以打压拜金主义风气，还可以缓解财政压力，有利于为藩政的推行提供物质基础。但是，单纯由统治者进行节衣缩食式的生活，必然存在欠缺。这是因为田沼时代以来，商品经济发展迅速而仓廩储备不足，民众不但要面临米价下跌，其他消费品物价上升的局面，还对自然灾害缺乏抵抗手段。于是，农业人口大量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农民大量涌向城市，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之一^[16]。因此，定信认为统治者不仅仅需要做到俭约质素，还需要做到以农为

本，不能让民众自生自灭。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定信开始自上而下推行复兴农村，弘扬农业伦理的运动。

3.农本：松平定信重农政策的实施

谈到江户时代中后期勤政爱民，以农为本的“明君”，松代藩的真田幸弘和白河藩的松平定信是不可忽视的两位大名。前者重用恩田木工，大力弘扬勤俭尚武之风，救恤百姓^[17]。后者则较为系统性地阐述了勤政爱民的重要性，并推行有利于保护农民的藩政改革措施。天明元年（1781年），尚未开始主导白河藩政的定信就已经在作品《国本论》中提到：

“（我等）可以亲近农民，但绝不可以蔑视农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定信）心常在于民下之疾苦、稼穡之艰难，虽然暂时无法亲自感受这些，但确实能够体会到^[18]”。

除了对农民包含关怀和敬意，松平定信还十分重视农民赖以生存的粮食经济，强调保护和发展农桑。他在后来的作品《政语》中直接表达了自己针对农业与民众的重视：

“民以食为天，所以农业才是政权之本业……（充足的）粮食和衣服才是王业的根基。古往今来，但凡实现治世的君主，都厉行节俭，重视农桑^{[12] [17]}”。

这样的农本思想，使得松平定信采取了俭约之外的方法改革藩政。他推行了一系列弘扬农业伦理的措施，试图复兴农村，并要求白河藩内的郡代（地方要员）“像对待自己的孩子那般，爱护农民”^{[8] [34]}。

天明四年（1784年）1月，松平定信和大名本多忠筹、细川重贤等人交流心得，学习对方的治藩经验^{[8] [58]}。在慎重考虑后，定信首先下令，奖励藩内对疾病预防和救济贫困者做出贡献者，以减少藩内农民的堕胎、流亡行为。其次，定信在藩内各郡代的宅邸前、柏崎的勘定所前、以及白河城内设置“目安箱”（收集民众意见的小箱子），允许藩内农民表达自身诉求。再次，在对家臣的教育方面，定信在会津町设置了学问所，征集好学问的家臣学习《大学》等经典儒学作品^{[8] [41]}。最后，在穿着方面，定信甚至在幕府的要求之上，进一步按照家臣的等级和俸禄高低，对他们的着装进行了细致的规定。

不难看出，复兴农村政策的目标，不仅是要保护农民，还旨在统一家臣的思想，强化对农村的保护和对等级制度的修复。松平定信之所以如此重视农业和农村，是受到当时的现实状况影响。自享保改革以来，农民面临着比以往更加巨大的年贡压力。由于定额租税制的推行和代官的横征暴敛，使得歉收等风险被转嫁到了农民身上，这导致请愿和暴动更加频繁地发生，民众的生活也越发艰难。恰逢这一时期，幕府先后由松平武元，田沼意次等人主政，他们推行殖产兴业政策（见本文第一节），培养特权群体，助力株仲間（日语「株仲間」，即行业商会）的发展，间接导致物资的流通不足和物价上涨，这就加剧了天明饥荒的破坏力，让天领和各藩的民众更加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上述以俭约质素和复兴农村的政策，极大地缓解了天明饥荒对白河藩的危害，“藩内农民对藩主感恩戴德，纷纷叩拜，流泪以表达感激之情”^[19]。至天明五年（1785年）初，白河藩政改革基本取得成功。如此功绩，使得年轻的松平定信备受关注。御三卿之一的一桥家当主一桥治济向御三家进行游说，他们最终联合推荐定信，使后者于天明七年（1787年）田沼意次败走政坛后，破格成为幕府老中，主导宽政改革^[20]。在为期七年的宽政改革中，松平定信一方面推出“旧归农里令”以促进破败的农村地区复兴，一方面下令设置石川岛人足寄场（救助所）以帮助无家可归者。这一措施旨在收留无家可归者，大批流入城市的农民群体与城市中贫困人口，让他们劳动或者学习技艺后，促使他们就业或者归农，起到复兴农村的作用。上述措施与白河藩政中推行俭约质素、复兴农村的改革一脉相承，也是定信的重农思想运用于幕政的直接体现。

4.结语

综上所述，松平定信的重农思想，可以归纳为俭约质素和以农为本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主题。前者强调统治者应该严于律己，节衣缩食，在减少支出的同时对民众起到表率作用；后者强调统治者必须勤政爱民，在俭约质素的基础上重视农村，保护农民。在重农思想的指导下，定信取得了白河藩政改革的成功，并由此开启了通往幕府权力中枢之路。

就思想的影响而言，由于“农业伦理是支撑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的江户政治的道德基础”^[21]，松平定信的重农思想，可以说是宝历、天明期以降，为了巩固受商品经济和异端学说冲击的农业

而衍生于德川幕府传统的新的思想理论从这个层面讲，天明期的白河藩政改革可以说是宽政改革的先声，并说明了作为彼时“日本二元统治结构”基本要素之一的藩，尚存生命力和弹性，幕藩体制的内在调整能力尚未达到极限。

上述思想及实践也为幕府和众多大名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借鉴。尤其是化政时期以降，强调俭约质素和保护民众的政策频繁出台。例如水野忠邦就在天保改革中向松平定信看齐，学习俭约质素的思想，发布“俭约令”，试图以节流手段重塑幕府财政^[22]；姬路藩的大名酒井忠道也曾效仿松平定信，参考《尚书》制定“固宁仓”制度以赈济灾民^[23]。这些政策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都和松平定信的重农思想与天明期的治藩实践有所联系。

就思想本身来看，松平定信的重农思想既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也存在着局限性。从积极方面来说，通过对定信重农思想和白河藩政改革进行解读可知，定信的思想虽然有明确的封建儒学伦理色彩，但却是对田沼时代以来，武士阶层风气败坏和町人地位上升的抵抗，并适应了天明饥荒时期赈济灾民，恢复农业生产的现实需要。尽管定信任老中期间的从政举措成为舆论和嗣后物议的焦点，赞赏者、谩骂者、谓功过各半者、谓三七分者皆有之，却少有人对节俭至“仅穿着素单衣和布裤，带着大酱盒饭登城就职”^[10]的定信提出思想和品行方面的批评。

但不可忽略的是，从消极方面来看，纵然松平定信天生英才，其重农思想和由此思想演化而来的治藩政策，也存在不少局限性。从相关白河藩政改革措施就可以看出，定信的政策重节流而轻开源，重保护而轻开发，这样的政策只能够救急，难以为日益贫困的武士阶层提供合理有效的生财之道，也就无法彻底解决元禄时代以降，“旗本武士贫困化，生活如农民一般困苦”等问题^[24]。这也是定信作为德川家出身的大名和老中无法触碰的界限。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同样生活在江户时代中后期的外样大名细川重贤就没有走定信的路子，反而是推行开发性的财政政策，养蚕制绢，充实府库^[25]。这类追求经济利益的政策，偏离了儒学义理，必然被定信所否定。他曾经引经据典，站在自己的角度彻底否定了利益追求型政治：

租税（年贡）以银来征收，这是小人之道……唐末多战事，租庸调皆以银纳，导致民众重利轻义，不再重视农耕，天下衰微……汉武帝时期的桑弘羊和唐玄宗时期的宇文融，都可以引以为戒^{[12] (43)}。

既然重商主义被否定，松平定信就不得不想方设法地选择重农道路，促进农村的复兴。为了保护 and 恢复白河藩的农业生产，他甚至强行要求越后领地的部分妇女移居到白河，以增加农业人口。即便如此，在商品经济发展，幕藩体制面临危机的18世纪晚期，统治者对儒学式治国之道在思想领域和政治实践中的竭力发扬，仍然难以抵御商品经济对自然经济的侵蚀。无论是化政时期的经济宽松，还是天保改革的历史逆流，都可以说是不同时代背景之下，幕府统治者对该问题的不同反应。总而言之，松平定信的重农思想及相关政治改革，虽然能在短时间内比较有效地应对自然灾害和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威胁，巩固封建领主阶层的统治，却难以从根本上，为幕府和诸藩寻找一条能够挽救幕府体制的道路。

参考文献：

- [1] 杉田玄白.後見草[M]// 国書刊行会.燕石十種·第一.東京：国書刊行会,1907:442.Sugita Genpaku. Kouken Sou[M]// Kokusho Kankoukai. Ensekijussyu vol.1. Tokyo: Kokusho Kankoukai, 1907: 442.
- [2] 北島正元. 德川將軍列伝[M]. 東京：秋田書店,1998:280.Kitajima Masamoto. Biographies of the Tokugawa Shoguns[M]. Tokyo: Akita Shoten, 1998: 280.
- [3] 黑板胜美.德川実紀·第十篇[M]東京：吉川弘文館,1991:725.Kokuban Katsumi. Tokugawa Jikki, vol.10[M]. Tokyo: Yoshikawa Kobunkan, 1991: 725.
- [4] 石井良助, 高柳真三.御触書天明集成[M].東京：岩波書店,1958.Ishii Ryosuke, Takayanagi Shinzou. Collection of Edicts during the Tenmei Era[M]. Tokyo: Iwanami Shoten, 1958.
- [5] 丁诺舟.日本江户时代的政治贿赂与幕府的应对[J].世界历史,2020, (3) :4.
- [6] 岡田唯吉.讃岐偉人平賀源内翁[M].香川：鎌田共済会,1934:8.Okada Yuikichi. The Great Man of Sanuki: Hiraga Gennai[M]. Kagawa: Kamata Kyosaikai, 1934: 8.
- [7] 日本歴史大辞典編集委員会.日本歴史大辞典別巻（日本歴史地図）[M].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86:39 図. Editorial Committee of Nihon Rekishi Daijiten. Supplement to the Encyclopedia of Japanese History: Historical Maps[M]. Tokyo: Kawade Shobo Shinsha, 1986: Picture 39.

- [8] 松平定信. 宇下人言・修行録[M]. 東京: 岩波書店, 1942. Matsudaira Sadanobu. Gekka Jingen & Shugyoroku[M]. Tokyo: Iwanami Shoten, 1942.
- [9] 高澤憲治. 松平定信[M]. 東京: 吉川弘文館, 2012. Takasawa Kenji. Matsudaira Sadanobu[M]. Tokyo: Yoshikawa Kobunkan, 2012.
- [10] 渋沢栄一. 楽翁公伝[M]. 東京: 岩波書店, 1938: 104. Shibusawa Eiichi. Biography of Lord Rakugo[M]. Tokyo: Iwanami Shoten, 1938.
- [11] 松平定信. 自教鑑[M]// 楽翁公遺書・上巻. 東京: 八尾書店, 1893: 2. Matsudaira Sadanobu. Jikyoukan (Self-Teaching Mirror)[M]// Rakugo-kou Isho vol.1. Tokyo: Yao Shoten, 1893: 2.
- [12] 松平定信. 政語[M]// 楽翁公遺書・上巻. 東京: 八尾書店, 1893. Matsudaira Sadanobu. Seigo (Political Discourse)[M]// Rakugo-kou Isho vol.1. Tokyo: Yao Shoten, 1893.
- [13] 石井良助. 徳川禁令考[M]. 東京: 創文社, 1981: 62. Ishii Ryosuke. A Study on the Tokugawa Bans[M]. Tokyo: Sobunsha, 1981: 62.
- [14] 许文英. 日本江戸時代后期大名权力演进以及影响——以德岛藩为中心的考察[J]. 世界历史, 2022, (4) : 62.
- [15] 松平定信. 修身録[M]// 楽翁公遺書・上巻. 東京: 八尾書店, 1893: 39. Matsudaira Sadanobu. Shushinroku (Record of Self-Cultivation)[M]// Rakugo-kou Isho vol.1. Tokyo: Yao Shoten, 1893: 39.
- [16] 柏村哲博. 日本寛政期幕政改革和地方行政[M]. 曾庆远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3: 56.
- [17] 恩田木工. 日暮硯[M]. 京都: 高島屋本店, 1935: 3. Onda Mokkou. Higure Suzuri (Twilight Inkstone)[M]. Kyoto: Takashimaya Main Store, 1935: 3.
- [18] 松平定信. 国本論[M]// 楽翁公遺書・上巻. 東京: 八尾書店, 1893年: 1. Matsudaira Sadanobu. Kokuhonron (On the National Foundation)[M]// Rakugo-kou Isho vol.1. Tokyo: Yao Shoten, 1893: 1.
- [19] 佐々木竜太郎. 少年松平定信伝[M]. 東京: 大同館書店, 1931: 121. Sasaki Ryutarō. The Youth of Matsudaira Sadanobu[M]. Tokyo: Daidokan Shoten, 1931: 121.
- [20] 栗田元次. 国史講座・江戸時代史[M]. 東京: 受験講座刊行会, 1930: 258. Kurita Genji. National History Course: History of the Edo Period[M]. Tokyo: Juken Kouza Kankoukai, 1930: 258.
- [21] 韩东育. 徳川幕府后期日本财政改革的正当性悖论[J]. 中国社会科学. 2018, (1): 184.
- [22] 平川新. 文政・天保期の幕政[M]// 岩波講座日本歴史・14・近世 5. 岩波書店, 2015: 13-14. Hirakawa Arata. Bakufu Politics during the Bunsei and Tenpou Periods[M]// Iwanami Series on Japanese History, vol.14: Early Modern Japan 5. Tokyo: Iwanami Shoten, 2015: 13-14.
- [23] 大石慎三郎. 江戸大名[M]. 郭永钦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 2011: 323.
- [24] 奈良本辰也. 日本の歴史・17・町人の実力[M]. 東京: 中央公論社, 1966: 177. Naramoto Tatsuya. Japanese History vol.17: The Power of the Townspeople[M]. Tokyo: Chuokoronsha, 1966: 177.
- [25] 有馬祐政. 鳥野幸次. 賢哲伝[M]. 東京: 修養文庫刊行会, 1919: 323. Arima Sukemasa, Torino Koji. Biographies of Wise Philosophers[M]. Tokyo: Shuyou Bunko Kankoukai, 1919: 323.